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理论再思

■ 王璇

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工人被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丧失了作为现实的人的主体性,人的全部“类本质”对人都异化了,甚至将人的自由自觉的生产劳动贬低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最后,人与人之间异化。马克思明确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生产环境下,工人被看作是资本本利的工具,在劳动异化的过程中工人和资本家对立存在:工人忍受痛苦,资本家享受财富。由此可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对立和异化是普遍存在的,包括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工人内部的利益冲突关系。

二、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再思——数字异化劳动

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劳动没有改变资本剥削的本质,并展现出新的四重异化形态。正如尼古拉·尼葛洛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我们时代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行,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

(一)数字劳动产品的异化
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的背景下,仍存在异化现象即数字产品的异己支配。数字时代的劳动产品不仅仅包括手机、电脑等实体形态,更多表现为APP、信息和数据等非实体形态。在如今流量为王的时代,数字用户在微博、抖音、小红书和知乎等数字平台上进行数字活动时,通过无意识的“隐形劳动”即上传、点赞和转发文字、音频、图像、视频等,创造了大量的原始数据和流量,但这并不属于用户所有,而是

被数字平台及其背后的数字资本家利用先进技术、海量数据库和用户信任,对这些数据进一步分析、预测,进行个性化内容推荐,制造信息茧房,致使用户掉进数字资本家精心营造的消费陷阱中。在这一过程中,数字用户无意识创造的信息、数据、流量等劳动产品不由自身占有和支配,但无形中已服务于资本积累,这就出现了一种数字用户给社会带来的价值越多自己所得到的价值越少的状态。因此,数字用户创造的数字产品越多,数字产品就会变成异己存在物反过来奴役着数字劳动者,作为一种异化的对立物而存在。

(二)数字劳动过程的异化
马克思曾说:“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数字资本家同样意识到空间的重要性,通过数字技术不断升级监控手段和方式,实时监测人们的现实和虚拟双重空间。一方面,数字资本家精确掌握劳动者的消费习惯和行为模式,实现从虚拟空间的管理中实施对现实生活的控制。例如,实时交通流量,根据数字用户常用的地图软件收集、分析用户的行程数据,给予用户最优交通路线,看似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但要意识到使用的前提是资本家收集并利用自身的数据库,才能实现交通智能化,但数字用户为资本家创造了数据和价值而不自知,这就是在无意间服务于资本积累。

另一方面,数字平台通过利用软件背后的监控路径,对劳动者和消费者进行全面监控。例如,在快消费时代,外卖骑手会被平台实时监控位置,平台通过大数据筛查提前为骑手选好送餐路线和预计到达时间等。数字监控不仅使得骑手模糊了其主观能动性,骑手的自主性得不到正常发挥,骑手还享受着平台的“监控”自以为是一种便利。同时,消费者也是被实时监控,数字资本家收集、分析消费者的个人信息、

浏览痕迹等数据,实时掌握消费者的购买需求和实际行动,如果用用户浏览过程中出现犹豫,平台甚至会给予个性化推荐最优商品和限时折扣,诱导用户消费,实现数字资本积累。因此,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没能摆脱异化,反而加剧了数字和劳动本身与数字劳动者之间的异化形成。

(三)数字劳动者类本质的异化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资本家为数字用户创造了一个虚拟现实世界,每个人成为了马尔库塞眼中的“单向度的人”。首先,资本逻辑下的技术应用加剧了数字劳动者对数字技术的依赖,作为劳动主体的本真状态不断被削弱。信息技术和数据算法辅助劳动者工作,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服务,但“使得大众在需求的虚假满足中将主体的不自由异化成了一种自由”,他们寻找着更少的异化,却承受了更多的剥削。劳动者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失去了主体本身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渐沦为依附于数字技术的“附属品”。

其次,数字劳动者的个体空间被资本压缩、时间被资本挤占。在资本主义的效应下,数字劳动者的空间被资本占有、支配,整个社会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加速运行,不仅将人类生活的物理空间转移到由互联网平台构成的虚拟空间中,而且劳动者失去了对空间的支配权。正如视频会议、网络课堂等线上办公平台的兴起,数字劳动者打开手机或电脑就能进行工作。如今,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技术被资本的欲望驱动,人们的精神愈发紧张,主体性一点点地被榨干,无形中从生产的决定者沦为数据信息的奴隶。因此,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数字劳动者与其类本质的异化不断加深。

(四)数字劳动者之间的异化
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兴起,数据成为了最为

关键的生产要素,数字资本家不仅在劳资关系中占据主导权,并在互联网平台的非真实性下掩盖其对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数字劳动者所产生的数据产品在被资本家收集、分析和销售的过程中,往往无法获得应有的报酬和认可,甚至被无偿占有。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和社会价值被严重低估,造成了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者的钳制。数字资本家在剥削数字劳动者的同时,不断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巩固数字资本的垄断地位,成为控制数据和技术的少数数字寡头,占有了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而大量数字劳动者则陷入贫困和疲乏之中,加剧了数字资本家与数字劳动者之间的两极对立。

再者,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许多重复性、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只需少量数字劳动者在智能工具的辅助下完成,这种技术替代导致了劳动市场的分化。掌握数字技术和劳动规律的数字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脱颖而出,成为所谓的“数字富民”,能够在劳动力就业市场占据主动地位。而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由于缺乏足够的数字素养和技术技能,被迫在“内卷”式的过度竞争中挣扎,日益沦为“数字贫民”,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这种内部的分化和敌对使得劳动者之间的信任和法治被严重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对抗,致使数字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异化为扭曲的、敌对的竞争关系,这种异化的关系使得数字劳动者再次陷入了新的困境和危机之中。

三、结语
纵观历史与现实,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进行再思,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理解,更有助于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迭代升级,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我们应正确把握和科学领悟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内涵,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和全球发展大势,以经典理论指导现实实践,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沿着科学发展的道路前进。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激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动力——以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为视点

■ 李美颖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明的建设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内蕴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元素中,展现出自身独有的历史基因和文化遗产。当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与历史地位,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一、把握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赓续中华文脉

突出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得以保存、发展、繁荣至今的密码。中华文明作为延续数千年且从未中断的古文明之一,正是因为具有连续性的特质,才能在经历民族融合、朝代更迭、文化交融后依旧保持独特文明的特性和文化传统。当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质,赓续中华文脉。一方面,稳定的社会结构与政治治理是中华文明存续至今的另一关键要素。农耕文明的社会结构具有天然稳定性、公共性和秩序性,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社会条件。中国传统政治治理则以“家国同构”为出发点,增强了中华儿女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认同感,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涵养了深厚的家国情怀。另一方面,稳定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特质,古今相继发展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关键所在。中华文明内蕴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在人们思想道德观念的形塑与学习生活方式的养成中仍对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与生活方式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要传承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又要依托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传承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夯实历史文化根基,赓续中华文脉。

二、把握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激活传统文明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是文明连续性的内在保障,也是坚持“四个自信”的基础与前提。“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秉持创新精神,延续创新性特质,在把握根与魂、源与流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传承与发展中华文明。一方面,创新性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相连接的重要桥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而是需要传承中华文明的特色与基因,并根据时代要求与社会发展需要对中华文明进行创新与转化,从而达到文明发展与进步的目的。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激活传统文明。另一方面,创新性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一环。文运与国运相牵,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基础,而文化复兴的首要前提便是进行文化创新。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在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转化,在吸收各国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创造出更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与时俱进的现代文明,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概而论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在激活传统文明基础上实现创新性发展,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三、把握中华文明的统一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统一性始终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质,是中华文明历经现代化进程仍蓬勃向上的核心要素。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统一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内在要求,大一统价值观、多元一体文明格局与多民族国家发展需要则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体现。一方面,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有助于增强中华儿女文化

认同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蕴含着对多民族文化的包容性,彰显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生动力,意味着各民族因共有中华文明而成为文化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凸显着浓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其中,中国传统社会观念、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作为人们积久而成的文明表现形式,是提升中华文明接受度和认同度的关键要素。因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与伦理道德、提升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各族人民对中华文明的共同坚守和坚定信仰,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信念基石和文化根脉。文明的统一建立在国家统一与民族统一的基础之上,完整的疆域领土与多民族的大团结是中华文明至今从未中断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深刻理解并把握中华文明内蕴的统一性的共同信念,始终秉持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决心与信心,为民族复兴提供凝聚力与向心力。

四、把握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展现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中华文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融合多元文化元素并始终保持开放包容、而不同的状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展现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一方面,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奠定了精神根基,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积淀了深厚文化底蘊。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把握好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彰显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蘊。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彰显着中华民族对待多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正确态度,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拓了交流互鉴新境界。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使得民族文化的多元性留存下来。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进一步秉承文明的包容性,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各国文明的养分,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自身,进而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五、把握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厚植胸怀天下的伟大情怀

“尚和”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始终遵循并传承的基本精神,是以“和为”为价值取向的理念、原则与规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厚植胸怀天下的伟大情怀。一方面,和平基因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延续至今的精神标识,和平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和合共生、互利共赢的价值理念,是当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精神指引。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遵循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特质,秉承和合共生、互利共赢的价值理念,发挥自身对世界文明的积极影响,推进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同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践行和平发展道路。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并不意味着无条件的退让、附和,而是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在保持自身个性前提下坚持“美美与共”“和而不同”。概而论之,建设中华民族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世界人民一道共同推动人类文明事业进步。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图书馆空间再造与读者体验提升

■ 谢波

随着数字化和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图书馆作为学术资源和学习场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不过传统的图书馆空间布局和服务模式已难以满足新时代读者的多样化需求。因此,图书馆空间再造成为提升读者体验、增强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本文旨在探讨图书馆空间再造与读者体验提升之间的关系,分析空间再造的具体策略及其对读者体验的影响,希望能为图书馆服务创新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图书馆空间再造的重要性

在信息化和数字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新时代学术要求的不断提升和学生学习需求的深刻变化,对图书馆的空间布局和功能设置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的图书馆空间布局往往较为单一,难以满足读者多样化的需求。通过空间再造,图书馆可以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学术需求,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空间布局和功能设置,以满足读者学习、交流、休息等多种需求。空间再造不仅是对物理空间的重新规划,更是对图书馆服务水平 and 品牌形象全面提升。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图书馆空间,不仅能够提升阅读环境的舒适度,还能够通过引入现代化设施和服務模式,增强图书馆的服务水平。比如,引入自助借还书系统、智能检索终端等现代化设施,可以大幅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效率,提升读者的使用体验。同时,图书馆还可以通过举办各类学术讲座、研讨会、展览等活动,丰富读者的学术生活,增强图书馆的品牌形象。一个环境优雅、设施齐全、服务周到的图书馆,往往能够成为读者心中的首选之地。这种口碑效应不仅能够提升图书馆的利用率,还能够为图书馆带来更多的资源和支持,促进图书馆的持续发展。

二、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具体策略

(一)空间设计的优化
1.打造数字化阅览室,引领阅读新风尚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蓬勃发展,图书馆作为知识与信息的汇聚地,其空间设计也需与时俱进,而打造数字化阅览室能为读者提供一个集电子书阅读、在线学习、多媒体体验于一体的综合环境。在数字化阅览区内,可以精心布置电子书阅读设备,这些设备不仅拥有高清舒适的显示屏,还能支持多种格式的电子书籍,满足读者对多样化阅读内容的需求。同时,电脑终端的配备,让读者能够轻松访问互联网,查阅最新的学术资料,进行在线学习,而多媒体设备的引入,如触摸屏查询机、虚拟现实体验设备等,更是为读者打开了通往知识世界的

新窗口,使他们在互动与探索中享受阅读的乐趣。数字化阅览区的打造,丰富了图书馆的阅读资源,更提升了读者的阅读效率与体验。在这里,读者可以摆脱纸质书籍的束缚,随时随地获取所需信息,实现知识的快速更新与积累。
2.增加休息区与交流区,营造温馨学术氛围
图书馆作为学术研究学习的圣地,其空间设计不仅要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更要注重营造一种温馨、舒适的学术氛围。为此,可以增加休息区、交流区和活动区等区域。其中,休息区的设计,应该以读者的舒适度为首要考虑。比如,可以选用柔软舒适的座椅,搭配柔和的灯光与绿植,为读者打造一个宁静的休憩空间。在这里,读者可以放下书本,闭目养神,或是沉浸在咖啡的香气中,享受片刻的宁静与放松。而交流区与活动区的设置,目的是促进读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我们可以根据读者的需求,划分出不同规模的小型讨论室与活动场地。这些区域不仅配备了舒适的视听设备,还能根据活动需要灵活调整布局。在这里,读者可以参与学术讲座、读书分享会等活动,与志同道合的人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分享学习心得。

(二)设施设备的升级
1.引入现代化设施,提升服务效率与质量
图书馆作为知识与智慧的殿堂,其设施配备的现代化程度直接影响着读者的阅读体验与学习效率。图书馆需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更新设施,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而自助借还书机的引入,无疑是图书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亮点。这些设备以其高效、便捷的特点,极大地缩短了读者的借阅时间,减少了排队等待的烦恼。读者只需轻轻一刷,即可完成图书的借阅与归还,整个过程快速流畅,大幅提升了图书馆的服务效率。同时,自助借还书机的使用,也减轻了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让他们能够有更多时间专注于为读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高速网络、多功能打印机、扫描仪等设备,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图书获取与处理方式。无论是查阅学术资料、打印学习资料,还是进行在线学习,这些设备都能为读者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它们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图书馆的服务内容,更提升了图书馆的整体服务质量,使图书馆成为读者心中不可或缺的学习圣地。

2.灵活配置家具设施,打造个性化学习空间
图书馆空间再造是提升读者体验、增强服务水平的的重要途径。通过优化空间设计,升级设施配备以及创新服务模式,图书馆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提供更加便捷、舒适、多样化的学习环境。未来,图书馆应继续探索和实践空间再造策略,不断推动图书馆服务的创新与发展。
(作者单位:火箭军士官学校)

基层治理的历史经验与法理逻辑:行政化与社会性的张力与界限

■ 隋艺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基层是“国家—社会组织系统中与民众最为接近的部分”,是国家政权与社会的联结部分,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互动的场域,是“民众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主要场所”。因此,基层治理是国家基础性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关系问题的集中体现,反映出行政化与社会性之间的张力。如何平衡基层中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是古今一直存在的难题,行政化与社会性之间张力的处理以及社会力量的再组织是古今处理基层治理的逻辑中心。因此,通过观察基层治理的历史变迁,提炼具有时空超越性特征和属性的问题,总结经验和教训,结合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新趋势,可以为推进有效有序的基层治理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传统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往往被概括为“皇权不下县”。传统中国的社会是“熟人社会”“礼俗社会”和“亲缘关系”的情感共同体。即使在民国时期,虽然建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但是城乡的管理仍然由传统的社会组织担负着重要的“自治”机能。
新中国成立后,延续了两年半以上的“皇权不下县”的国家—社会关系终于被打破,1954年形成了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基

层管理体制。新中国初期是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管理由运动治理模式向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转型的重要时期。街居制确立前后,国家反复调整基层政权、组织建设,体现了平衡行政化与社会性之间张力的历史阶段。与当下基层治理转型所遇困境亦有相似之处。
街居制确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探索。第一阶段,社会性压倒行政化导致基层管理失序,市以下的社会空间中国家基础性权力缺失,社会空间过度膨胀,缺乏统一有力的领导,不可避免地导致基层管理的失序。第二阶段,行政化与社会性的短暂平衡。1950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大城市区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要求将区政府恢复为一级政权机关,并在派出所内增设民政干事。很多地区成立了街道办事处等具有居民自治性质的街道组织。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实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平衡。第三阶段,行政化压倒社会性,确立社会主义街居制。伴随着经济界的社会主义改造,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1954年经过基层政权、组织的社会主义整合,区以下的两层组织(街居组织、居民组)变成三层组织(街居组织、居民委员会、居民组),形成街居制。
现代中国社会处于管理与服务到治理转

型的关键时期,基层治理的实践路线主要是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党和国家的共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依然需要应对行政化与社会性之间的张力、社会力量的再组织、社会参与等问题。古今城市基层治理的困境及其应对逻辑具有相通性,通过新中国初期的基层治理经验可知,过分强调弱化社会空间中的国家基础性权力,不符合我国社会治理的实际,必然会导致基层治理失序问题。另一方面,过度压缩社会性,也不适合当下社会与经济发展趋势。因此,必须“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基层党组织不能缺席,并且必须健全并强大,这不意味着国家基础性权力挤压社会权利的空间,而是要求党组织在基层的多元共治中起到强有力的领导和引导作用,同时需要制定法律、法规保障适时调整行政化与社会性的空间,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基层治理无效和失序问题。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辽宁省城市基层治理法治创新路径问题研究”(项目编号:L22BFX004)。
(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